



俄罗斯家庭结构的变化

熊小奇

俄罗斯的家庭结构目前面临着社会经济变更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正十分困难地被改造着。笔者近年来在圣·彼得堡大学进修，曾对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居民户的家庭结构进行过一些典型调查。现根据掌握的资料着重谈谈俄罗斯家庭结构变化中的几个特点。

1. 家庭结构的松散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演变，俄罗斯家庭内部基本关系的轴心正由血缘关系向姻亲关系转变。在以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结构中出现了松散化的趋势。

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俄罗斯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家庭的夫妻关系采取松散的“联邦”形式。据圣·彼得堡中心区“家庭咨询服务部”1990年对2000个家庭的调查，以大男子主义为特征的“依赖型家庭”由1985年的32%下降为25%，而以“独立自主，互不干涉”为原则的“联邦”式家庭则由28%上升到37%。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倾向于传统式家庭关系的男人在俄罗斯还为数不少，但在俄罗斯妇女中，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倾向于“联邦”形式家庭关系的正越来越多。

目前，子女对父母尚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当代俄罗斯青年的家庭观念已不那么浓厚，一旦经济独立，获得新的住房，他们便很快与父母分开。圣·彼得堡大教堂对千名新婚夫妇的问卷显示，有62%的新婚夫妇希望能与长辈分开。在俄罗斯城市的公园和街头上，许多孤独的老人牵着狗为伴的现象随处可见。

西南四省区的地位相当重要。“三普”以来，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四普”与“三普”相比，四川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3.6%，年平均增长3.7%，增长速度高于汉族3.6倍；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增长51.44%，而汉族人口只增长0.09%，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9.62%，年均增长率达2.27%，比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近1个百分点；广西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8.96%，年平均增长2.2%，分别比汉族人口高4.82和0.53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除了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所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之外，还由于各项民族政策的落实以及在招工、招干、招生、参军等多方面对

少数民族的照顾，使得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恢复和申报更改为少数民族成份的人数大量增加，同时，由于这些政策导向的作用，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后所生育的子女也绝大部分申报为少数民族。代表们普遍认为，少数民族也应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少数民族本身繁荣进步的需要，只有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才有利于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此外，代表们还对人口迁移、城镇化、老龄人口、人口普查工作方法和资料评价等进行了讨论、交流。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就国内外人口研究方向、形势作了专题发言。

(李士创 韦仪)

与家庭关系松散化相联系的是婚前、婚外同居人数剧增。在俄罗斯，两性关系和性生活已变得较为自由，而来自亲友、邻里方面的监督个人行为的旧方式和社会舆论的制约已经衰微。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内，男女婚前、婚外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校方对此不过问，舆论也不指责。据莫斯科大学周报透露，在校大学生婚前、婚外同居者达72%（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多为单身套房）。

不少人对组建家庭不感兴趣，认为过同居生活比较自由，不受法律约束。在城市车站和街头广告栏内常可看到征召特殊“保姆”的广告，上面注明“身高1.65米以上”、“年轻漂亮”等等条件，所给的工资报酬也高得多。据当地人介绍，其中不少是征召“婚外恋人”或者是独身者征召临时伴侣。同居后感情合得来就继续在一起，否则就分手。分手后男方可不负责同居期间所生孩子的生活费；愿意给一些就给，不给的话女方也无办法。

伴随家庭结构的松散化，家庭教育潜在能力和家庭价值观念的下降，俄罗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精神病现象以及“不幸的和有问题的家庭”的数量急剧上升。俄罗斯学术界中一部分人惊呼，家庭发展在现阶段出现了“危机”，“家庭在解体和崩溃”，“家庭要根除自己”；但大多数人认为，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危机”，而是标志着家庭婚姻制度改革时期的到来。适应现代生活条件的、结构比较松散、简单的、灵活而民主的家庭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和发展趋势。

2. 家庭中离婚的现象增多

原苏联离婚率的递增速度很快。1950年的离婚率是3%，1960年为10%，1970年为27%，1980年上升为34%^①。近几年来离婚率又有了新的突破，据《圣·彼得堡晚报》透露，1990年莫斯科的离婚率为56%，圣·彼得堡为58%^②。

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离婚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根据圣·彼得堡5个区人民法院的材料，有70%的新婚夫妇在婚后的头一年就申请离婚；离婚中60%是妇女提出的，其中有一半是由于丈夫酗酒、打骂妻子而引起的；因丈夫酗酒和酒精中毒在所有离婚原因中占第一位，比例达62%。俄罗斯人普遍认为，原苏联政府的禁酒运动不但未收到成效，反而刺激了人们饮酒的欲望。在街头巷尾，常可见到许多酒鬼在买到伏特加后就躲在墙角处一饮而尽，他们中一些人回到家里把满腹怨气发泄到妻子身上。近几年来妇女酗酒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因而引起了各级政府机构的极大重视。由于酒精中毒，婴儿死亡率空前增长，这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人口的增长。

离婚率在“年轻家庭”中的增长尤其突出。据1990年的统计，在俄罗斯缔结不到四年就离异的婚姻占离婚总数的42.5%。年轻家长中离婚的增多与西方的“婚姻价值观念”、“享乐主义”和“性解放”的流行是分不开的。在圣·彼得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2/3以上男青年的择偶标准是：“漂亮、年轻”，“象小猫一样的听话”，“能像母亲一样在生活上照顾自己”；有3/4的女青年则倾心于“有钱、有地位的男子”，“希望自己的丈夫能象父亲一样经常给自己送礼物”。在社会经济激烈动荡的条件下，人们的经济地位在迅速变化着，这常使一些以金钱享受为择偶标准的妇女另找靠山，而有钱的男人也常见异思迁。

①引自“人口繁殖与家庭”，见前〔苏〕《社会学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第87页。前苏联离婚率的数据通常来自婚姻管理机构，表示当年办理的高婚对数与当年办理的结婚总数的比率。

②引自《列宁格勒晚报》1991年7月23日。该报现更名为《圣·彼得堡晚报》。

③由圣·彼得堡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ИСЭП）提供。

离婚人数的不断增多使社会舆论对离婚变得越来越宽容，离婚者在作为婚姻选择对象时渐渐不再被看成是“二等品”，离婚在法律手续上也简单化了，商业性的婚姻介绍所、咨询所、性学中心以及地下俱乐部大量涌现；从西方涌入的大量色情录像带在城市各录像点由地下转为公开放映（发给营业执照）。上述因素客观上助长了性的自由化运动和泛滥。

3. 妇女普遍不愿意多生育

俄罗斯的年轻家庭普遍是三口之家，许多地区出现了由多子女家庭变为一至两个子女家庭的明显趋势，人口问题愈来愈突出。俄罗斯学者经研究认为，为了维持人口的简单再生产，一般来说父母这一代应由数量相当的子女这一代来取代。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俄罗斯平均有18%以上的婚姻是无生育能力的，部分妇女根本就不结婚，所以要使下一代人不减少，每个家庭必须至少要养三个能活到结婚年龄的孩子。

俄罗斯妇女不愿多生育孩子，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和社会福利缺乏保障而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多子女的母亲能享受许多优惠（例如原商业部门规定“5个孩子的母亲”享有购买“明斯克”冰箱等紧俏商品的优先权），如今物价放开后这些已经失去意义，多子女的补贴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已愈来愈微不足道。1991年俄罗斯有8.5%的家庭表示不要孩子。政府对出生率的下降颇为着急，要求有关学者加强研究、制定对策，在经济和社会福利上实行鼓励政策。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影响出生率下降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心理因素。他们以摩尔多瓦为例，该共和国1980年比1960年工资增加了一倍，消费资金中各种津贴和优惠增加4.7倍，而出生率却下降了9%。他们认为，随着家庭关系的淡薄，人们对生育更多的子女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工流产人数增多，据1990年莫斯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人口研究室统计，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做人工流产的有187人。此外，随着近些年来离婚率剧增带来的种种恶果，由于害怕家庭牵累而根本不想结婚的妇女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据该人口研究室统计，俄罗斯有900万已达婚龄的青年没有结婚，带着孩子的女青年中几乎有一半以上不再结婚，这些“单身母亲”不断地充实着“独身主义”者的队伍。

4. 社会经济震荡下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社会经济的剧烈震荡直接冲击着俄罗斯现有的2500万退休老人。在原苏联，一般干部和职工只能领到相当于原工资50%的退休金，工龄在20年以上者退休金仅增加10%。在经济形势恶化、物价上涨、社会福利缺乏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人的生活十分艰难。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如看大门、卖报纸、卖汽车票和摆地摊等。

社会经济的动荡使前苏联曾一度消声匿迹的卖淫现象又重新泛滥起来。如今在俄罗斯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尤其在火车站、旅馆、公共场所等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常可见到妓女的身影。加入卖淫队伍的有许多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其中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原因。在圣·彼得堡，中学生的问卷显示，在中学女孩子中最受羡慕的职业有两个：一是商店经理，二是“国际女郎”。

卖淫现象和离婚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孩子有母无父。统计数字表明，平均每100个离婚家庭中遭难的孩子将近120个，他们几乎全随母亲。现俄罗斯离婚案每年60多万起，这意味着每年有70多万孩子沦为孤儿，再加上大量的私生子，构成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